

## 評介黃自進、潘光哲主編《中日戰爭 和東亞變局》<sup>\*</sup>

蘇聖雄<sup>\*\*</sup>

黃自進、潘光哲主編，《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》，上、下冊。臺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18年。996頁。

### 一

21世紀是全球化的時代，世界各國文化交流日益密切，相互之間有趨同的力量，亦有互相碰撞的衝突，於此情態，相互理解實屬重要。有鑑於此，長期研究日本與中國社會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（Ezra F. Vogel），推動中國、日本與西方學者共同研究中日戰爭，期望對於各自的歧異有清楚、客觀的了解，未來再透過這些研究成果，影響政治領袖，促進各國間的和解。

共同研究計畫自2000年開始籌備，中國方面的學者由楊天石召集，日本方面由山田辰雄、平野健一召集；召集人設定主題，組織學者，再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，相互研討攻錯。參與的學術機構，包括哈佛大學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

---

<sup>\*</sup>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，特此致謝。

收稿日期：2019年3月18日；通過刊登日期：2019年4月11日。

<sup>\*\*</sup>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

究所、日本慶應大學等。2002年，首次研討會於美國哈佛大學召開，迄今，共同研究已經舉辦6次學術研討會，無疑已成為跨國研究中日戰爭的重要平台。

共同研究發起於美國，日本、中國參與籌備，臺灣學者僅以個別身分參加。2013年，臺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（以下簡稱中研院近史所）正式加入該研究，同時獲得第六次會議的主辦權，加深臺灣學界對於國際中日戰爭史研究的交流。該次會議的主題，初始規劃為「中日戰爭結束前後時期的亞洲情勢」，爾後經各合作單位討論，修改為「中日戰爭衝擊下的亞洲」。

會議延續過去的傳統，由各國共同組織辦理。臺灣方面為中研院近史所蔣介石研究群，歐美為劍橋大學東亞系，日本為日中關係史研究會，中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。經過四方共同籌備，甄選與會發表學者，會議於2015年12月19至20日在臺北中研院近史所召開，總計提交發表59篇論文。會後經過編輯小組篩選，收錄28篇論文出版專書，書名不以會議名稱命名，改稱為《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》，分兩冊出版，以顯會議精華。此即本文所評之專書。<sup>1</sup>

## 二

本書最大之特點，為跨國多元。這點承襲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10多年之傳統，踏出國際藩籬，呈現多元視野。考察書中作者出身背景，即可呈現此一跨國研究之涵蓋多方：包括臺灣學者10名，日本學者4名，中國大陸學者3名，英國學者3名，韓國學者2名，另有加拿大、緬甸、越南、印度、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旅日學者各1名。

集合多國學者，使得研究課題更顯多元，主題涵蓋東亞各國。中日戰爭牽涉的東亞國家，除最重要的中國、日本外，尚有蘇聯（遠東部分）、韓國、馬來西亞、越南、緬甸、寮國、印度，這些國家本書皆有所述。藉由多位東亞學者對各自國家的研究，呈現了各地在戰爭中遭遇的衝擊，豐富中日戰爭的全貌。如緬甸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以闡述全書主軸為主，不全面摘述單篇論文，未提及之作者、篇名，並非不重要，望作者諒察。

方面，久綏寧（Kyaw Swe Nyunt）撰〈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緬甸克欽人的政治影響及對整體經濟、社會與政治局勢的衝擊〉，探討緬甸少數民族克欽人政治立場的轉折、緬甸反抗軍的成就、戰後克欽人的爭取獨立。文末並從心理、經濟、政治三方面，探討中日戰爭對緬甸的衝擊，從而擴大文中探討的層面，由克欽人擴及整個緬甸。印度方面，蘭札娜·穆庫帕迪亞（Ranjana Mukhopadhyaya）撰〈二次大戰期間印度與日本領袖間之互動：殖民與後殖民時期東亞關係的一端〉，以印度政治領袖對中日戰爭及大亞洲主義認知的差異為線索，探討印度政界的分歧及其影響。韓國方面，探討的有兩篇文章，一是探討韓國臨時政府，一是研究東北抗日聯軍。前者為裴京漢所撰〈國民政府對韓國臨時政府還國問題的對應——終戰前後時期重建東北亞國際秩序的一個側面〉，討論何以國民政府在韓國獨立問題上，無法發揮影響力，以致駐紮在重慶的韓國臨時政府，不能獲得國際承認的始末。後者為鄭炯兒的〈戰後東北亞地區勢力範圍的重建與東北抗日聯軍的角色〉，研究東北抗日聯軍（以下簡稱「抗聯」）的成立與衰退、前往蘇聯和改編，以及如何在戰爭結束後進駐東北和進行接收工作，復述其於東北及北朝鮮地區活動的情況，進而解析蘇軍或中共何以在戰後能迅速有效控制東北及北朝鮮。

除了亞洲多國視野，中國少數民族及海外華人的研究，也豐富本書的多元性。吳啟訥撰〈戰爭、民族與國家——抗戰前後雲南土司的困境與抉擇，1942-1952〉，探討了雲南境內各個非漢人族群，在經歷戰爭及亞洲殖民秩序全面崩解後，如何溶入中華民族。而朱法源的〈中日首戰緬甸（1942年）與華僑華人〉，則將研究主軸置於緬甸華僑，從英、日、中角力等大脈絡下探討戰前至1942年的緬甸僑界。

當時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，其歷史也應進入中日戰爭的視野。李盈慧的〈日本占領期間臺灣人的形象和行動：華僑的觀點〉，便豐富本書這方面的研究，該文討論太平洋戰爭期間，在日軍占領下的東南亞，華僑印象中的臺灣人，也就是從華僑的角度看臺灣人，以呈現歷史記憶的不同面貌。

### 三

跨國多元的研究，將這場戰爭延伸至亞洲各地，開拓研究的空間。至於傳統中日戰爭研究領域，如中日間的外交、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等方面，在史料推陳出新、研究視角移轉之際，仍然具有深探之價值。本書對於這方面亦有所著墨，進一步深入堂奧。

就外交而論，中日戰爭是兩國間的交戰，爾後並演變為世界大戰的一部分，牽涉多國，因此，外交一直是研究的焦點。這方面的研究，有探討國際之間的互動，也有探究一國的外交政策。

探討國與國互動者，如黃自進的〈前哨戰的政治外交：中日兩國在華北的角逐（1933-1935）〉，探討代表華北在地勢力的黃郛及宋哲元等人，於1930年代初期所扮演的角色，並且分析國民政府、日本政府、日本軍方以及宋哲元等四方勢力之較勁，為後來全面戰爭的爆發，找尋關鍵的背景因素。又如李君山的〈1937年《九國公約》布魯塞爾會議之探討〉，以《九國公約》為線索，綜觀自1921年華盛頓會議舉行、1922年《九國公約》成立後，以迄1937年布魯塞爾會議召開，其間中、日兩國危機之關係，探究國際調停中日戰爭失敗的經緯。

外交是多方競合，研究多國之間的互動關係，可以獲得整體圖像。不過，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或體制，深刻影響她與其他國家的互動，因此從單一國家入手研究，對於理解整體情勢有其意義。本書中數篇文章，便分別從中國、日本方面，探討其外交政策。從中國入手者，如吳景平〈戰時外交體制之得失：以宋子文為中心〉一文，從宋子文的活動來看戰時外交體制的運作模式，由於過去戰時外交研究，以具體決策個案居多，專門研究外交體制較少，本文頗可補充學界之不足。至於探討日本的外交政策，可見諸兩位日本學者的文章。戶部良一撰〈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對中國的和平構想〉，探討戰爭末期小磯國昭內閣推動對華媾和政策的始末，呈現其內閣對於戰後東亞國際政治秩序重建的構思。波多野澄雄〈戰爭末期的中日戰爭與日蘇關係——以「日中蘇」合作構想為中心〉一文，與戶部良一文章相呼應，論述小磯內閣與蘇聯的關係，並特別探討日本外相重光葵於戰爭末期，所倡導的日中蘇合作論。

外交而外，中日戰爭終究為兩國間的武裝對抗，研析軍事勢所必然。在這個方面，本書收入張瑞德的〈侍從室與戰時中國的軍事〉，首論侍從室的成立始末，復次介紹其組織架構，最後則評析其於抗戰期間所扮演的角色及所發揮的功能。另一篇為馬振犢的〈1938年至1940年新四軍致國民政府戰報檔案研究〉一文，首先介紹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新四軍戰報檔案概況及其內容，然後分析戰報中新四軍作戰情況與成果等。文中藉由戰報呈現新四軍頻繁的出擊次數，復比對其他相關檔案史料，指出一般指控新四軍「游而不擊」，並不符史實。

以上概述本書外交、軍事之內容，其他政治、經濟等方面，亦為傳統中日戰爭史研究重點，為本書所涵括。這些論文大抵能依據新的史料，增補過去的研究，由於篇幅有限，本文不一一摘述。

#### 四

戰爭結束前後的中國，是本書另一重要主題。從政府高層的設計、規劃，戰爭審判，基層社會，乃至於戰後願景，都有所闡述。就政府高層來說，段瑞聰的〈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對日講和構想——以三份和約草案為線索〉，探討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對日講和構想的變化；三份和約草案，代表國民政府在不同時期為因應時勢，而有不同的應對措施。戰爭審判方面，顧若鵬（Barak Kushner）的〈法律與帝國——對日關係中「正義」的掙扎（1944-1947）〉，以「競爭正義」（competitive justice）為思考基礎，探討國民政府如何藉由審判戰犯彰顯法律上的正義光環，分析審判過程中所遭受的壓力，析論審判是否達到目的，復述論其深遠影響。

基層社會與文化是近年中日戰爭史研究的發展熱點，本書收入數篇論文探討這個主題，其中聚焦於戰爭結束前後的，如戴安娜·拉里（Diana Lary）所撰〈勝利東流〉，探討中日戰爭結束後的歸鄉運動，呈現戰爭對中國社會的衝擊及其巨大影響。該文指出，漫長、艱辛且所費不貲的旅途，令歸鄉人的身心極度疲乏，而更大的衝擊莫過於目睹故鄉的殘破，以及舊有秩序的全面崩潰，於

是，本該是國民政府最忠實支持者的菁英與中產階級，反而轉向中共，視之為可終結一切動亂的新希望，成為日後支援中共革命的一項助力。又如亞倫·威廉·穆爾（Aaron W. Moore）所撰〈困難的請求：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最後執政時期（1945-1949）學生致教育部長的信件〉，以學生致教育部長的信函為史料，呈現青年的失望、生活的困難，說明如此種種，皆導致國民黨失去青年的信任。戴安娜及穆爾的這兩篇論文，從基層的角度呈現戰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力量的消長，也等於從社會基礎層面說明國共政權何以更替。

戰爭結束之後，中國人心皆望和平、繁榮，政府高層與知識分子，提出各式各樣的願景。方德萬（Hans van de Ven）在〈日本在中國的投降——九·九·九〉一文中，介紹蔣中正《中國之命運》、毛澤東《新民主主義論》及郭沫若〈甲申三百年祭〉等三種對中國願景的不同論述，藉此勾勒出戰後中國的時代風貌。該文副標題的九·九·九，所指為中國數字「九」的發音與「久」相同，有「長久」或「持久」之意，這亦是南京受降為何會選定於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的由來；亦即，對中國人而言，9月9日9時舉辦的受降儀式，是期望和平可以「永遠、永遠、永遠地」持續下去，然而，最後事與願違。本文頗能抓住結束戰爭、展望未來之歷史氛圍，由於全書在各篇之後並無總結，若以本文視作總結，亦可稱恰當。

## 五

本書之特點為跨國多元、舊題深入、延伸戰後，這也可以說是目前中日戰爭史研究的新動向。例如中國大陸，當前正以國家層級推動抗日戰史，其召開的大規模研討會，必定邀請外國學者參與。諸位學者所發表的題目，總體看來，涵蓋甚廣，多方延伸，對舊題也仍然涉獵。本書作為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六次會議之精選，在中日戰爭史的學術會議中，較具代表性，也更能凸顯研究動向之一斑。

作為一部論文集，本書呈現會議研討成果，已達致其目標。不過，若以專書



的角度來看，則似仍有可增補之處。第一、本書標題，由會議主題的「中日戰爭結束前後時期的亞洲情勢」、「中日戰爭衝擊下的亞洲」，演變而為「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」，可見題目不甚聚焦，略為寬泛。本以探討亞洲為主，後以東亞為範圍，含括國家較多，卻仍有香港、菲律賓等不在其內，則寬泛中又有所不足。主題未能集中的結果，是各篇各說各話，缺乏統合。書前導言確為精當的各篇摘要，呈現歷史學者超越國界、突破意識型態、實事求是展開學術研究的綜合成果，惟摘要沒有著意發揮統合之作用；當然，這也是因為歷史之錯綜複雜，論述之地域過廣，勾勒整體非一筆可成之故。

第二、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之發起，其目標為相互討論，促進和解，各篇以各自角度立論，事屬必然，然而會議上精彩的討論，所引發的反思，卻無法切實從本書傳達給讀者。如馬振犢藉由考察新四軍的戰報，批駁對中共「游而不擊」的指控，直接挑戰國軍的正統史觀，在會上引起熱烈討論，在本書中無法看到。因此，未來若出版類似專書，或可考慮將各場會議的討論精要整理出來，又或者考慮將會議最後的綜合討論以摘要呈現。

第三，本書各篇專論，足以呈現學術較新的動向，各篇徵引書目，也多引用較新著作、未開發的史料，呈現了中日戰爭研究與史料刊布的整體進展。如張連紅撰〈基督的力量：南京大屠殺期間難民的宗教生活〉，運用南京大屠殺時留在南京的西方傳教士日記、書信和報告等資料，探討屠殺期間南京難民的宗教生活，藉由新史料，開拓了新課題。又如陳慈玉的〈二戰結束前日本對東北基礎產業的投資〉，大量運用一手、二手史料，聚焦於20世紀前半葉中國東北煤礦業、鋼鐵業、水泥業與電力事業的發展，以及此等發展與日本投資之間的互動關係，儼然一部東北經濟發展史。因此，本書既然已呈現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，建議可仿中日戰爭共同研究第二次討論成果——英文版的：*The Battle for China: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-Japanese War of 1937-1945*,<sup>2</sup> 於全書之末，分別列舉英文、中文、日文的最新研究成果，便利讀者查閱，嘉惠學界。

---

<sup>2</sup> Mark Peattie, Edward Drea, and Hans van de Ven, ed., *The Battle for China: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-Japanese War of 1937-1945*, (Stanford, Calif.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). 這次研討成果，尚有中文版、日文版，所收論文有些許出入。

綜而言之，本書延續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的成果，確可呈現「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」之整體歷史圖像。在全球化的今日，國際共同研究無疑需要且必要，本書可說展示了中日戰爭史跨國研究的潛力。